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

(三)

 **BOOK**
内部资料 非商品

第一章

保卫抗战胜利果实， 准备应付全面内战

第一节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形势 和我党的方针

（参见附图1）

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15日，天皇裕仁以广播“停战诏书”形式宣布投降，9月2日签署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至此结束，中国人民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的德国、意大利、日本被打败，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受到了严重的削弱，只有美国帝国主义在战争中发了横财，国民生产总值比战前增加一倍以上，军事力量也跃居资本主义各国的首位。美国凭借它经济、军事上的优势和对原子弹的垄断，在全世界推行侵略扩张政策，扶植和支持各国反动势力，镇压人民革命运动，力图称霸全世界。

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为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胜利开辟了道路。战后，世界人民的革命力量有了重大的发展。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政治觉悟空前提高。经受了战争考验的社会主义苏联，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而日益强大。东欧和亚洲一些国家，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起来的人民民主政权正日趋巩固。各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争取民主和民族独立的斗争风起云涌。资本主义各国人民反对美国控制和本国反动派的斗争也日益高涨。在战时获得很大发展的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对本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所有这些，形成了制止新的世界大战，推动世界历史前进的强大力量。“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的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⁹¹

社会主义苏联是支持各国人民革命运动，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侵略扩张行径的重要力量。苏美之间，既存在着尖锐斗争的一面；也存在着在某些问题、包括某些重要问题上谋求妥协的一面。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达成的雅尔塔协定，就是这种妥协的表现。如何处理这种妥协与本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关系，是各国革命人民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他撰写的《关于月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一文中作了明确的阐述：“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⁹¹

在中国，随着日本的投降，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集团，同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广大人民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新时期的斗争，集中表现在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上。蒋介石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下，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则主张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

⁹¹ 自毛泽东《关于重庆谈判》，《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162页。

⁹¹ 自《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181页。

国家。这是一场关系到中国前途和人民命运的严重斗争。

按照蒋介石的既定方针，是要用战争手段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但是，日本投降后立即发动全面内战还有许多困难：在国际上，美、英、苏三国从各自的利益和战略目标出发，都表示赞成中国发生内战。在国内，久经战争摧残的广大人民，普遍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国民党内一部分人也反对打内战。国内外的这种压力，迫使蒋介石不得不考虑发动全面内战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同时，日本宣布投降时，蒋介石全面内战的准备工作也还没有完成。他的440万军队，有一半以上还位于远离内战前线的西南、西北大后方，而被日伪军占领的华东、华北地区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又大部分处于我八路军、新四军的包围之中，战略态势对国民党非常不利。上述种种情况，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以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三次电邀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重庆举行和平谈判，企图用“和平”手段，即以共产党人到国民党政府中去“做官”为交换条件，让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的政权，达到消灭革命力量的目的。同时，蒋介石仍然积极进行全面内战的准备。在日伪军的掩护下，迅速调动大量兵力到华北、华东、东北地区，以“受降”的名义，抢占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完成对解放区的分割包围，以便在适当时机发动内战。蒋介石在1945年9月20日给各战区司令长官的一份密电中就曾明白地说明了他的上述企图：“目前与好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

美国政府为控制中国，变中国为它的附庸，一方面，支持蒋介石的“和平”谈判，并派遣驻华大使赫尔利到延安迎接毛泽东去重庆，期望通过谈判实现有利于国民党所希望得到的那种“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的“和平”，另一方面，又竭力从各方面援助蒋介石的内战准备：提供大批飞机、军舰运送国民党军到内战前线；派出9万人的海军陆战队进驻上海、青岛、天津、北平、秦皇岛等城市，帮助国民党控制这些战略要地。担任远东盟军统帅的美国将军麦克阿瑟，还严令侵华日军只能向国民党军投降。美国总统杜鲁门在他的回忆录中讲到美国的意图时说：“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末整个中国就将会被共产党拿过去。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将国民党的军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办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的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⁹¹美国帝国主义的上述政策，使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变得更加复杂，更加艰巨。

在长期战争中受尽了苦难的中国人民，迫切希望抗战胜利后国家能走上和平建设的道路，实现民族的独立和社会的解放。代表人民意志的中国共产党，顺应民心，早在1945年4月至6月召开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明确地指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以后，中国存在着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⁹²。我们全党和全中国人民的任务，就是要建设一

⁹¹ 自《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72页。

⁹² 见毛泽东《两个中国之命运》，《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026页。

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即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日本投降后，中国共产党又为争取实现国内和平进行了不懈的努力。8月25日发表了《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指出：“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同时决定派遣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委员王若飞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8月26日，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向全党进一步阐述了争取和平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指出：“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国民党“内部矛盾甚多，困难甚大。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

1945年8月29日，国共双方在重庆开始谈判。在谈判中，我党从保护人民基本利益的立场出发，针对美、蒋企图取消我党所领导的军队的阴谋，坚持了“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⁸的原则，同时，在不损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前提下，作出了一些让步，包括决定撤出分布在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等八个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军队。和平谈判历经43天，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署了《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国民党被迫表示同意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认各党派的平等地位和人民的某些权利。但军队的整编问题和解放区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由两党代表继续进行洽商。

我党在争取和平的同时，对于内战的严重危险，也作了清醒的估计。党中央、毛泽东主席一再告诫全党全军，要吸取我党在1927年对蒋介石的反革命突然袭击毫无准备而招致失败的惨痛教训，做好充分的精神准备，“有了准备，就能恰当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⁹。党中央还根据蒋介石拖延谈判时间，积极准备内战的情况，反复提醒全党全军，绝对不要依靠谈判，不要指望国民党发善心，而要把一切工作的立足点放在国民党要打内战的基点上。对国民党军向解放区的进犯，要站在自卫的立场上进行坚决的回击，“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¹⁰。党中央指出，全党全军在日本投降后的任务是：“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其数量与规模，依情况决定。一部分地区，如江南、豫、鄂、晋、绥等地，第一阶段之时间可能甚短，对此应有充分估计。”¹¹

面对蒋介石在美国的援助下准备发动内战的严重局面，党中央还指出，

⁸ 见毛泽东《关于重庆谈判》。《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159页。

⁹ 见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134页。

¹⁰ 见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127页。

¹¹ 自中共中央1945年8月11日《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

我们的斗争不是孤立的，它得到全世界进步势力的广泛同情和支持。我们将努力争取国际援助，但不依赖国际援助，要把我们的方针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败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

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上述方针，及时而有力地统一了全党全军的思想，为我军投入保卫抗战胜利果实的斗争，发展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胜利指明了方向。

第二节 加速实行战略转变，调整战略部署

在日本宣布投降，蒋介石准备发动全面内战的情况下，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政治形势、作战对象的变化和敌我力量对比的状况，及时作出了实行党的军事战略转变的决策。这一转变既是适应对日本侵略军实施大反攻的需要，又是为了战胜国民党军发动的大规模进攻。这一转变的中心是作战形式由游击战为主转变为运动战为主。实行这一转变，首先要集结力量，建立起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为此，党中央在1945年8月11日《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中就指出：“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各地应将我军大部迅速集中，脱离分散游击状态，分甲乙丙三等，组织成团或旅或师，变成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集中行动，以便在解决敌伪时保证我军取得胜利。解决敌伪后，主力应迅速集结整训，提高战斗力，准备用于制止内战方面。”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还要求，正规兵团的数量应占全部兵力的3/5到2/3；这种兵团，从连、营、团、旅（师）至纵队，基本上按“三三制”编成；各解放区应建立实施机动作战的指挥机构，并依情况辖若干纵队，直接受中央军委和各中央局的指挥，人员给养的补充供应则仍由所在区域军区负责；正规兵团的首长、机关不再兼军区、军分区的首长、机关。在集中主力组建正规兵团的同时，应保留和建立必要数量的地方部队，并加强民兵建设。

各解放区遵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上述指示，迅速集中主力，编组了能在较大范围内实施机动作战的正规兵团，并建立了相应的指挥机构，逐步形成了以正规兵团（即野战军）为主体的，与地方部队、民兵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为实行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的军事战略转变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与此同时，在部队中进行了加强集中统一、加强组织纪律性的教育，克服伴随长期游击战争所带来的游击性和地方性；并结合实战，及时总结经验，提高正规战的能力，从而使部队的思想、作风、战术逐渐适应迎击国民党军大举进攻的需要。

自日本宣布投降到1945年9月中旬，蒋介石在国共谈判中借口所谓军令政令必须统一，妄图取消我党所领导的解放区和军队，使谈判处于僵持局面。与此同时，国民党军则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在日伪军的接应下，进占了临近解放区的徐州、开封、郑州、洛阳、太原、归绥等城市，并继续沿平汉、同蒲、平绥、津浦各铁路推进。我华中苏南、浙东、皖南、皖中等解放区和豫西、中原、湘粤边等解放区，已处于国民党军重兵包围之下。在这些地区的部队，有被国民党军各个击破的危险。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山东、华中各解放区也面临着国民党军的严重威胁。但东北地区和热河省则是国民党势力薄弱的地区，国民党军在短时期内还无法大量到达，苏军在东北仅占领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其余广大地区多为土匪、伪满军警所控制，我军为对日反攻而进入东北的冀热辽军区和胶东军区的部队，在东北抗日联军的配合下，已控制了若干地区并迅速扩展了力量。

依据上述情况，在毛泽东赴渝期间代理中共中央主席的刘少奇，为党中央起草了《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部署的指示》，于1945年9月19日发给各大单位。《指示》指出：“目前我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

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¹⁵，发展东北并争取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为实现上述任务，《指示》还作了如下部署：（一）晋察冀（除冀东外）及晋绥两区坚决打击国民党军自绥远和可能自北平向张家口的进攻，保障对察哈尔全境、绥远大部、山西北部及河北一部的占领，使之成为以张家口为中心的基本战略根据地之一。（二）山东主力及大部分干部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第一步由山东调三万兵力到冀东，协助冀热辽军区完全控制冀东、锦州、热河，并在苏军撤退时阻止国民党军进入东北、热河；另由山东调3万兵力进入东北，求得发展并取得装备。（三）新四军调8万兵力到山东和冀东，保障与发展山东根据地及冀热辽地区。新四军苏浙军区部队撤向苏南、苏中，皖南部队撤向皖中。中共中央华中局改为华东局，迁到山东临沂地区，在华中另组华中分局，受华东局领导。（四）晋冀鲁豫军区全力阻止并打击国民党军北上部队，并准备3万兵力于11月调到冀东和进入东北。指示最后强调：“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

东北地区有人口3400余万，面积100余万平方公里。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将原东北三省（辽宁、吉林、黑龙江）划分为辽宁、辽北、安东、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及兴安等九省。东北工业发达，资源丰富，交通便利；南与冀热辽、晋察冀和山东各根据地相邻，东、西、北三面与朝鲜、蒙古、苏联接壤，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党中央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的中心思想，就是集中力量力争控制和发展东北，以改变敌人在战略上对我长期四面包围的局面，并依靠已有的工业和资源，将东北建成我党我军的主要战略基地，支援关内解放区的斗争。

各中央局和各战略区遵照党中央的上述方针和有关的具体指示，迅速调整了部署，形成了有利于应付全面内战的战略布局。

东北地区 1945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东北局，并先后调派政治局委员彭真、陈云、高岗、张闻天以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林彪、李富春、李立三、罗荣桓、林枫、蔡畅、王稼祥、黄克诚、王首道、谭政、程子华、万毅、古大存、陈郁、吕正操、肖劲光等去东北工作；同时，又组织指挥各解放区开赴东北的部队和干部，海陆并进，日夜兼程向东北进发。10月31日，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我军所有进入东北的部队及由抗日联军扩建的东北人民自卫军，统一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至11月底，到达东北的部队计有：山东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第七师，第五师一部，鲁中警备第三旅，渤海、鲁中、胶

东和滨海军区地方部队各一部，滨海支队、田松支队、山东军区直属队等部共6万余人，新四军第三师（辖第七、第八、第十旅和独立旅）3万余人；陕甘宁第三五九旅、教导第二旅、警备第一旅各一部及延安抗大、延安炮校等部共万余人，晋绥第三十二团，冀中第三十一团，冀鲁豫第二十一团。以上连同先期进入东北的冀热辽部队一部共11万余人。从延安及各解放区抽

¹⁵ 察两省，指热河省、察哈尔省。热河省原辖区包括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及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1955年撤销。察哈尔省原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1949年改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及山西省北部。1952年撤销，原辖区分别划归河北省、山西省。

调的党政军干部2万余人（包括准备用于建立100个团的各级干部）也陆续到达。上述部队和干部到达后，迅速扩大整编成21个师（旅），建立了锦热、辽宁、辽东、辽西、辽北、吉林、松江、三江、嫩江、北安等10个军区。各部队陆续进入东、南、西、北满[※]广大地区，进行肃清匪伪，发动群众，建立基层民主政权等工作。1946年1月14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总兵力发展到27万人。

华东地区自1945年9月下旬起，新四军苏浙军区的部队除留少数游击武装就地坚持斗争外，主力自浙东、浙西、苏南向苏皖边区转移；10月，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率淮南第二师、淮北第四师的主力及皖中第七师北移山东。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下辖鲁南、鲁中、胶东、滨海、渤海5个军区，共有地方部队18万人。北移的部队，会同原山东军区一部主力编成津浦前线野战军（1946年1月改称山东野战军），下辖第七、第八师和第二纵队，约5万余人。另在苏皖地区组成华中军区，下辖8个分区，约11万人；以苏浙军区北移部队的两个纵队及苏中、苏北、淮南、淮北留下的部分主力和地方武装组成华中野战军，下辖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纵队，共4万余人。苏浙军区的另两个纵队及苏中地区部分武装组成第一纵队，向东北开进。1946年1月到达胶济路淄川附近后，因形势变化，解除开赴东北的任务，改归津浦前线野战军建制。

中原地区日本投降后，长期坚持在以大别山为中心的中原抗日根据地的新四军第五师，遭到国民党军的重兵包围，处境困难。与此同时，进至湘粤边开创抗日局面的由八路军第三五九旅一部组成的南下支队，在豫西嵩山地区坚持抗日的河南军区部队，均在国民党军围困袭击下无法立足。中共中央为使这两支部队摆脱孤立困难的处境，并加强中原力量，令该两部向第五师靠拢，在中原地区牵制国民党军部分兵力，给华北、华东部队的作战和进军东北以战略上的配合。上述三支部队及领导人在枣阳以北地区会合后，于1945年10月组成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下辖由河南军区部队和水西区（即贾鲁河西部地区）第二十八团组成的第一纵队，由第五师和南下支队组成的第二纵队，以及江汉、鄂东、河南3个军区，全区野战军、地方军各约3万人。

晋察冀地区晋察冀军区为适应在晋察冀和冀察热辽两个方向同国民党军作战的需要，先后组成两支野战军。在晋察冀方向的第一野战军，以冀察、冀中、冀晋军区各一个纵队编成；在冀察热辽方向的第二野战军，以冀热辽军区两个纵队和冀察、冀中、冀晋军区各一个纵队，以及到达热河后奉命停止进入东北的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编成。晋察冀军区辖冀热辽军区和冀察、冀中、冀晋军区，全区有野战军18万余人，地方部队12万余人。

晋冀鲁豫地区194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统一太岳、太行、冀鲁豫、冀南解放区的领导，组成中共中央晋冀鲁豫局（又称邯郸局）和晋冀鲁豫军区，下辖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4个军区。10月，晋冀鲁豫军区将上述4个军区的主力部队依次组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纵队，组成晋

[※]、南、西、北满。东满指当时中中路沈阳至长春线门东的吉林、西安（今东辽）、延吉、安图、敦化等地区；南满指当时中中路沈阳至大连线以东的庄河、安东（今丹东）、通化、临江、清原和沈阳西南的辽中等地区；西满指当时中中路沈阳至哈尔滨线以西的齐齐哈尔、洮南（今洮安）、扶余、双辽、开鲁、阜新等地区；北满指哈尔滨、牡丹江、佳木斯、北安等地区。

冀鲁豫军区野战军。11月，晋冀鲁豫军区奉命以第一纵队开赴东北，另以太行、冀鲁豫军区的主力编组第六、第七纵队。至此，全军区共有野战部队8万余人，地方部队23万余人。

晋绥陕甘宁地区日本投降后，为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晋绥军区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中分出，辖吕梁、雁门、绥蒙军区，另以军区主力部队4个旅组成野战军。全区野战军和地方部队共3万余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在晋绥军区分出后，仍保留原番号，辖5个旅和5个分区，其中4个分区由旅兼，全区共3万余人。

华南地区长期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东江纵队和琼崖独立纵队等部，共2.7万余人，在国民党军包围清剿的情况下，分散在粤北、赣南、海南岛等地区坚持斗争。

我军依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调整战略部署后，在东北完成了战略展开，发展成一支强大的力量，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独占东北，南北夹击我关内解放区的企图；撤出孤悬于国民党统治区腹心的南方各解放区，不仅使这些地区的部队避免了被各个击破的危险，而且加强了华北、华东各解放区的力量，巩固了我党我军的基本阵地。从而使我军形成了应付全面内战的有利战略态势。

第三节 反击国民党军的进攻。停战协定的签订

(参见附图 2)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在同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迅速调动兵力沿平绥、同蒲、平汉、津浦等铁路向解放区推进和进攻。截至九月中旬，共调动了 36 个军、73 个师，其进攻情况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于 9 月上旬出动第十九、第二十三、第三十三、第三十四、第六十一、第八十三军及骑兵第一军等 7 个军，以主力进占同蒲铁路沿线；一部进入我上党地区（以长治为中心的晋东南地区，古称上党郡）。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出动第二十二、第三十五、第六十七军、暂编第三军、骑兵第一集团军及东北挺进军等 6 个军，其中 4 个军在夺占归绥（今呼和浩特）、集宁等 5 城后，沿平绥铁路（北平至归绥）东进，先头已逼近张家口。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出动第一、第三、第十六、第二十七、第三十八、第七十八、第八十五、第九十军等 8 个军，其主力东出潼关，沿陇海铁路东进，先头已抵郑州；一部北渡黄河，沿同蒲路进至临汾以北，准备进占石家庄、北平、天津。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以第十五、第四十军及新八军等 3 个军沿平汉铁路向新乡推进，准备与胡宗南部会合于石家庄；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率第十二、第九十七军及骑兵第二军等 3 个军进占商丘、徐州，准备打通津浦路徐州、济南段。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以第七、第四十八军进占浦口、蚌埠，拟与徐州的国民党军相衔接。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出动第六十三、第六十五军，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出动第四军围攻我进至湘粤边的八路军南下支队。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出动第四十一、第四十七、第五十五、第六十八军等 4 个军包围中原我军。10 月、11 月，美国以军舰、飞机陆续将国民党的第九十二、第九十四、第十三、第五十二军分别运到天津、北平、秦皇岛等城，以接应沿铁路线推进的国民党军主力。国民党的企图是，迅速控制华北、华东的战略要地和交通线，分割我解放区，打开进入东北的通路并抢占东北，然后以强大的军事压力，迫使我党在谈判中屈服。

为了打破蒋介石的企图，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心在平汉、同蒲、平绥、津浦路沿线，开展交通破击战，继续肃清日伪残余据点，控制一段铁路，开辟战场；尔后集中主力，相机组织几个有力战役，打击沿铁路进犯的国民党军，以迟滞敌人前进，巩固华北、华东解放区，掩护我军的部署调整，特别是在东北的战略展开，并加强我党在国共谈判中的地位，达到争取和平的目的。

在此期间，我军依照党中央、中央军委上述意图。进行了以下一些主要的战役。

上党战役（参见附图 3）1945 年 8 月 21 日之前，国民党军第二战区依据其统帅部关于特别注意接收上党区的指示，以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 4 个步兵师及一个挺进纵队（相当于师），自临汾、浮山、翼城进占被我地方武装包围的长治、长子、壶关、屯留等城和已为我解放的襄垣、潞城。该敌以军部率第六十八、第六十九师主力及暂编第三十八师一部守备长治，以其余部队及伪军部署于襄垣、长子、屯留、潞城、壶关诸城，企图以此为基地侵占整个晋东南解放区。与此同时，第一战区第三、第十六军经风陵渡到达运城以南，第十一战区以第十五军留置豫西，以第四十军、新八军及第三十军向郑州集中，拟沿平汉路向北推进。

自8月26日起，中共中央军委先后指示晋冀鲁豫军区首长：集中太行、太岳军区主力首先歼灭阎锡山进入长治的部队，收复上党地区，消除腹心之患。并强调指出，长治等城堡坚垒密，须有充分准备，切不可草率，进攻时宜选择一两城，各个击破。9月4日，军委又进一步指出：在进行上党战役中，阎（锡山）如从太原、临汾、平遥等地来援，于我有利，待其进至适当地域给以歼灭，你们应有此独立的机动的灵活作战准备。”晋冀鲁豫军区首长根据上述指示，抓住侵入上党的史泽波部孤军深入、守备分散的弱点，决心集中正在进行整编的太行、冀南、太岳3个纵队及地方部队一部共3.1万余人，并动员5万民兵配合作战，轮流以主力一部由北而南地逐次夺取长治外围各城，以主力的大部配置在机动位置，准备在野战中歼灭由长治出援的敌人，尔后攻取长治，相机歼灭可能自太原、平遥来援的敌人。同时，以冀鲁豫军区主力及太行、冀南军区部队各一部，在新乡以北、石家庄以南平汉路沿线肃清日伪军；以太岳军区部队破击同蒲路南段，迟滞胡宗南部北进，为上党战役结束后转用主力于平汉或同蒲路作战准备战场。

依据上述部署，各参战部队一面向上党地区开进，一面进行整编和政治动员。在开进途中，太行纵队于9月1日攻克襄垣，歼敌一部。9月10日，战役正式发起，我军首先攻击屯留。长治的敌人曾两度出援，但与我打援部队一经接触即迅速缩回。我军于12日攻克屯留，17日又攻占潞城，截断了长治与太原、平遥的联系。19日，我军攻克长子、壶关。以上共歼敌7000余人，孤立了长治守敌。20日，我军开始围攻长治。24日，获悉太原之敌3个师于22日自子洪镇沿白晋路南下增援。晋冀鲁豫军区首长决心以冀南纵队及地方部队围困长治，吸引援敌；以太行纵队及太岳纵队主力北上，求歼援敌于运动中。10月2日，我军将援敌合围于鹿亭以南老爷岭附近地域。这时，我发现援敌为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率领的第二十三、第八十三军共6个师及由伪军改编的省防军一部。为确保打援兵力的优势，晋冀鲁豫军区首长急调冀南纵队北上参战，并以左右两翼部队猛攻敌人，而在北面留一缺口，诱敌向北突围，以求歼敌于突围途中。5日，我左翼部队攻占老爷岭主峰阵地。经我军多日围困攻击而饥疲不堪的敌人，于当夜夜间向北突围，被我军先机抢占鹿亭以北土落村附近制高点的部队截住。我军实施平行追击和跟踪追击的部队，多路楔入敌阵，向敌猛攻。激战至6日，敌除一部逃回沁县外，其余全部被歼，彭毓斌被击毙。长治敌人待援无望，于8日向西突围。我以太岳纵队自鹿亭取捷径直出沁水以北的马壁，协同追击部队于12日歼灭突围之敌于桃川堡附近地域，俘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

这次战役，共歼敌11个师及1个挺进纵队共3.5万余人，缴获山炮24门，机枪2000余挺，长短枪1.6万余支。我军伤亡约4000人。上党战役给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巩固了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后方，显示了解放区军民保卫抗战胜利果实的力量和决心，加强了我党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这次战役是我军反击国民党军进攻所进行的第一个较大规模的歼灭战，意义十分重大，经验也非常宝贵。我军在总兵力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所以能取得战役的胜利，主要经验是：对敌情判断准确，战役决心正确，指挥果断；初战必胜的思想明确，战役的各项准备工作充分；通过兵力的机动转用，以及在次要方向充分发挥地方部队和民兵的作用；确保主要作战方向的兵力优势；利用围城打援、攻城打援、迫敌突围等手段，争取歼敌于运动中。

邯郸战役（亦称平汉战役）（参见附图4）上党战役结束后，敌第十一

战区的个四十、第三十、新编第八军共7个师，于10月14日采取“并列重叠配置”，以第四十军及工兵第九团为右翼兵团，以新八军及第三十军为左翼兵团，分两路自新乡北进，第三十二军尾随第四十军等部进至安阳为第二梯队，企图与进占石家庄的第一战区第三、第十六军会合，然后继续北进，与空运到达北平的第九十二、第九十四军南北会师，完全控制平汉路。新八军是西北军，有我党的工作基础，该军中的民主分子对蒋介石歧视吞并非嫡系部队和驱使他们充当内战先锋深为不满。

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在进行上党战役期间，曾以一部兵力肃清新乡以北平汉路沿线日伪军，基本上控制了从淇县至高邑的200余公里铁路，为主力遂行邯郸战役开辟了战场。

10月中旬，中央军委指示晋冀鲁豫军区：“山东、华中主力转移至冀热辽区及东北，至快还须一月；各部到达后，布置战场，熟悉地形，初步完成准备，至快亦须两月至三月。因此，我们阻碍和迟滞顽军北进，是当前严重的战略任务”。要求晋冀鲁豫军区除一部兵力截击沿同蒲路北进的第一战区后续部队外，集中主力，由刘伯承、邓小平亲自指挥，对付沿平汉路北进之敌，务求歼灭其一部或大部。在打法上，军委指出，必须审慎忍耐，以逸待劳，诱敌深入到安阳、沙河之间于我有利的地区，再坚决扼制之，逼迫敌全部或大部展开，我主力再从敌暴露的翼侧或后方进行猛烈突击而歼灭之。

晋冀鲁豫军区首长根据军委的意图，决心集中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及冀鲁豫、冀南、太行军区部队各一部共6万人，并动员10万民兵配合作战，在漳河以北、邯郸以南的滏阳河套地区歼灭由新乡北进之敌；在给敌以军事打击的同时，争取新八军战场起义。预定的作战方案是：首先以太行、冀鲁豫军区部队和民兵，在黄河以北至安阳间破坏铁路，加强袭扰，以疲惫和迟滞敌人，掩护我军主力向作战地区集中；待敌渡过漳河后，立即以一部兵力控制漳河渡口，切断其与安阳之敌的联系。同时，以第二纵队自上党地区先行东进，配合已在平汉路作战的部队，肃清盘踞于临漳、成安、临洛关（今永年）等地的伪军，并组织预定战场附近的军民，破路填沟，拆碉平寨，使进入预设战场的敌人无所依托。我军歼敌的具体部署是：第一纵队和冀鲁豫军区部队为路西军，对敌实施钳击并予以分割围歼。

敌人自新乡北进途中，在我地方部队和民兵的不断袭扰和节节抗击下，进展迟缓。为保障我军主力向作战地域集中，晋冀鲁豫军区首长令位于临漳的第一纵队阻击敌人，并将敌遏止于邯郸以南。24日，敌人3个军全部渡过漳河，并沿平汉路东侧推进到马头镇、磁县间地域。这时，我军迅速按预定部署将敌包围，同时控制漳河渡口。敌在我四面包围和不断攻击下，急忙向南北左良、崔曲等地收缩，并急电蒋介石求援。26日，石家庄之敌第十六军、安阳之敌第三十二军各以一部南北对进，增援被围的敌人。我军在加紧攻击被围敌人的同时，一面增调太行军区部队一部，协同晋察冀部队一部在高邑阻击由石家庄南援之敌；一面加强漳河阻援阵地和在安阳以南袭扰敌人，阻止和拖住第三十二军。28日黄昏，我对被围之敌发起总攻，同时派军区参谋长李达赴新八军军部，敦促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部起义。战至30日，敌第四十军的第一〇六师大部被歼，第三十军也遭到有力打击。这时，新八军大部及河北民军等部约万人宣布起义，使敌人的兵力骤减，部署呈现缺口，军心动摇。晋冀鲁豫军区首、长判断，其余敌人可能突

围南窰，决心迫敌脱离阵地后，歼敌于运动中。31日，敌人采取逐次掩护的部署开始突围南窰。这时，我第一、第三纵队已先机转移到敌退路两侧，立即从东西两面向敌实施多路突击，太行、冀鲁豫军区部队则前出到漳河北岸对敌实施兜击，并组织民兵在各要道捕捉溃散敌人。至11月2日，敌人除少数漏网外，被我全歼于临漳、磁县间的旗杆樟、辛庄、马营地域。石家庄、安阳的援敌闻讯缩回。

这次战役，除新八军等部起义外，我共毙伤敌3000余人，俘敌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以下1.7万余人，缴获大批武器物资。我军伤亡4700余人。这是我军继上党战役后给予国民党军的又一次沉重打击，在国民党内部引起了很大震动，对阻止和迟滞国民党军沿平汉路北进，掩护我军调整部署及争取国内和平的斗争，均有重大作用。战役的主要经验是：对进攻之敌应审慎忍耐，诱敌深入到精心选择和设置的战场，然后集中优势兵力一举将敌包围，并采取有力的措施，阻止和拖住增援的敌人，保障主力歼击被围之敌；充分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在军事打击的同时，成功地争取了新八军等部起义；当敌企图突围时，我适时网开一面，并以主力先机转移到敌退路两侧，歼敌于运动中。

绥远战役 1945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国民党军第十二战区傅作义部联合绥蒙伪军，进占归绥、武川、陶林、丰镇、集宁、兴和等城后，其新编骑兵第四师、第三十五、第六十七、暂编第三军等部集结于丰镇至归绥的平绥路沿线，绥蒙伪军暂编骑兵第五师、第一旅分别在凉城、陶林等地。敌总兵力共6万余人，企图夺占我张家口，控制平绥路。

9月11日，中央军委指示晋察冀和晋绥军区集结主要兵力，组织绥远战役，并指出，这一战役对我党在北方的地位和争取全国和平局面的关系极为重大，必须坚决歼灭傅作义部主力。为达到这一目的，中央军委于10月22日又指示：“如傅部固守归绥，则先将包头、五原、固阳占领，使傅部绝食突围，然后歼灭之。如我能迅进，可能速占归绥”。27日又进一步强调：“此次作战，必须达成歼灭傅顽主力之目的，应将我主力运动到傅顽阵地背后去，由西向东打，方可聚歼”。

遵照军委的指示，晋察冀军区集中冀察、冀晋、冀中3个纵队，晋绥军区集中5个旅，共14个旅5.3万余人，遂行绥远战役。作战部署是：以晋察冀部队由东向西攻击，首先歼灭隆盛庄、张皋的敌人，尔后各个歼灭丰镇、集宁间的敌人；晋绥部队于歼灭凉城、陶林等地之敌后向集宁发展进攻。尔后，两区继续协力求歼敌于绥远东部地区。

战役自10月18日开始，晋察冀部队攻克张皋、隆盛庄，晋绥部队占领凉城、陶林，歼敌第三十五军及暂编骑兵第一旅各一部。敌遭此打击后，急忙向集宁、归绥方向收缩。晋察冀部队乘势推进，于24日收复集宁、丰镇，守敌乘隙西撤！晋绥部队向卓资山发展进攻，25日，歼灭敌第六十七军所属之新编第二十六师5000余人。26日，敌全线西撤，第三十五军、暂编第三军、新编骑兵第四师等部2.4万余人猬集归绥，第六十七军等部1.2万余人集结包头，并加强工事，准备凭坚固守。10月31日起，我军集中兵力围攻归绥，由于敌人依托坚固工事进行防御，我缺乏攻城经验及所需火力，以致历时半月未能攻克。11月1日，晋绥之独一旅、骑兵旅及冀察纵队一部沿铁路向包头前进，至7日，连克兵亥州、察素齐、沙尔沁，共歼敌5个骑兵团，逼近包头。之后，我军改变部署，由晋察冀部队围困归绥，晋绥部队攻取包

头，以调动归绥之敌出援，求得野战，并准备在攻克包头后，晋绥部队东返与晋察冀部队合力攻取归绥。12日，我军进攻包头，未果。24日至30日先后击溃了由归绥、五原增援包头之敌新编骑兵第四师和骑兵第十师；12月2日再次集中兵力攻取包头，但数度攻击仍未奏效，且时值严寒，土工作业及部队食宿都遇到极大困难，无法再战。我军遂于4日、14日先后撤出对包头、归绥的包围，转入休整。

这次战役共歼敌1.2万余人，收复了绥东、绥南广大地区，打破了敌控制平绥路的企图。但由于我军在收复丰镇、集宁前后，主力未能及时西进断敌退路，加之傅作义较善用兵，迅速西撤，集结归绥、包头，凭坚固守，致使我军失去野战歼敌的机会，被迫攻坚。在攻城战中，我军由于火力不足和缺乏攻坚经验，进展缓慢，形成僵持局面，直至严冬已到，不得不撤出战斗。

津浦路徐（州）济（南）段战役 1945年10月，敌第十二军、骑兵第二军乘我山东主力开赴东北和新四军入鲁部队尚未到达山东之隙，由徐州沿津浦路北进，在日伪军掩护下进占济南；伪第三方面军吴化文部万余人进至滕县、兖州、泰安；第九十七军进到临城附近；第五十一、第七十七军及由伪军改编的第六路军郝鹏举部等占领韩庄至台儿庄之线；第七、第四十八军占领浦口、蚌埠。11月起，敌继续向津浦路增加兵力，企图首先控制津浦路南京、济南段，尔后向天津、北平及东北推进。

10月12日，中央军委指示新四军军长陈毅、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目前山东与华中的中心任务（除出兵东北外）就是截断津浦路，阻止顽军北上并力求消灭北上顽军之一部或大部”。要求新四军以北移山东的主力 and 原山东军区部分主力，迅速组成津浦前线野战军，在徐州、济南间组织战役。据此，新四军首长作了以下部署：首先以山东第八师及鲁南军区部队攻歼邹县、临城之敌，以鲁中军区部队攻歼兖州、泰安之敌，切断铁路，开辟战场；俟新四军主力到达山东后，再集中力量打击继续由徐州北进的敌人。

战役从10月18日开始，到11月上旬，我军先后攻占邹县、大汶口，在界河以伏击手段歼灭吴化文部第一军3个师，控制了兖州、滕县间一段铁路，截断了国民党军北进的通路。下旬，津浦前线野战军主力南移韩庄、滕县段扩展攻势，歼日伪军4000余人。12月12日，我第八师在第九旅等部的直接配合下，向孤立于滕县的第十九集团军第二前进指挥所及其所属的部队攻击，经3日激战，歼敌前指及暂编第一旅等部9000余人。我第八师师长王麓水在滕县战斗中光荣牺牲。1946年1月7日，由津浦前线野战军改称的山东野战军，在华中野战军一部配合下，在台儿庄、枣庄、临城线及津浦路中段向北进之敌发起进攻，到13日先后克宁阳、韩庄，包围兖州、泰安、临城、枣庄；在军事压力和政治争取下，第六路军郝鹏举部万余人起义，改编为华中民主联军。

这次战役，我军以伤亡6000人的代价，歼敌2.8万余人，缴获大批武器物资，控制铁路200余公里，挫败了敌人打通津浦路的企图，有力地配合了我党争取和平的斗争。

在进行上述各主要战役的同时，各战略区为巩固和扩大解放区，争取我军的有利态势，进行了一系列的战役、战斗。晋冀鲁豫军区部队解放了肥乡、衡水、济宁等城，歼伪军1.5万余人；其第四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出击同蒲路南段，肃清了阎锡山驻守闻喜、浮山、翼城的部队，控制了一段铁路，切

断了阎锡山部与胡宗南部的联系。华中野战军在伍佑镇歼灭伪军孙良诚部第三十九师，迫使盐城伪第四军 6000 人投降，接着又先后攻克高邮、新安镇等地，歼日伪军 1.6 万余人，控制了运河扬州以北段和陇海路徐州以东段，使山东、华中解放区联成一片。晋察冀部队在古北口、喜峰口及锦承路沿线，阻止了北宁路（北平至沈阳）锦州以南各敌向平北、热河解放区的进犯。冀热辽部队和山东第七师在山海关抗击敌第十三、第五十二军的进攻，为我军在东北的展开赢得了时间。陕甘宁部队在安边争取了国民党军新编第十一旅旅部率 1 个团起义，并全歼其另 1 个团。中原部队分别在湖阳镇、双沟镇反击敌之进攻，各歼敌千余人。

美国政府露骨的扶蒋反共政策，导致了国共冲突的日益加剧，并因而引起了美国国内舆论的谴责和美国统治集团中某些代表人物的不满。在这种形势下，美国政府决定部分地修改它的对华政策。1945 年 11 月 27 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免去了公开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赫尔利驻华大使职务，12 月 15 日又发表对华政策声明。他一方面宣称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是“达到统一中国目标之恰当机构”，要求中国共产党把军队交给政府；另一方面又强调“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其他意见不同的武装部队之间应协商停止敌对行动”，“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的国民会议，以谋早日解决目前的内争——以促成中国之统一”。⁵¹并决定委派马歇尔为总统特使赴华调处。1945 年 12 月 16 日至 26 日在莫斯科召开的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也发表公报，表示希望“有一统一与民主之中国”，“国民政府各级机构中民主党派之广泛参与及内部冲突之停止，均属必要”⁵¹。面对国际上巨大压力的蒋介石，从 3 个月军事较量的失败中，也感到需要争取时间，以便进一步调动军队，完成全面内战的部署，因此迅速同意重开谈判，并表示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解决国是。接着，国民政府代表与我党代表经几度商谈，于 1946 年 1 月 5 日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并于 1 月 10 日正式公布。同时国共双方依据协议下达了“停战令”，规定从 1 月 13 日起双方停止一切战斗行动。国民政府代表张群、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也在此时组成军事三人小组，并在北平建立了由三方代表郑介民、叶剑英、罗伯逊及三方人员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以监督停战，调处冲突。1 月 10 日，由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召开，并于 1 月 31 日一致通过了包括军事问题、宪法草案问题、和平建国纲领、政府组织问题、国民大会问题在内的《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案》（即政协决议）。停战协定的签订和政协决议的达成，是中共中央在抗战胜利后坚持正确的方针，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所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和平愿望与民主要求，得到各阶层人民的拥护。

从日本投降到 1946 年 1 月签订停战协定，我军坚决贯彻了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在中央军委的指挥下，取得了反击国民党军进攻的重大胜利。蒋介石要迅速控制华北、华东和东北大城市及交通要道的企图没有完全得逞；进驻北平、天津、青岛、济南、锦州等地的国民党军，处于被我军包围而无所作为的境地。与此同时，我军的力量日益增强，战略态势更加有利，并且

⁵¹ 自美国国务院 1949 年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628 页。

⁵¹ 自 1945 年 12 月 27 日《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公报》。

取得了歼灭装备上占有很大优势的国民党军的经验。这些经验虽然还只是初步的，但却非常宝贵，对尔后我军还击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具有重要作用。

第四节 反对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进一步做好对付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

一、反对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的斗争

停战协定签订和政协决议达成后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就背信弃义地加以破坏。1946年2月，国民党的特务、暴徒，先后在重庆、北平等城市制造了一系列反共反民主的严重事件。3月1日至17日，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公然否定政协通过的宪草修改原则。接着，又在中国共产党及主要民主党派拒绝参加的情况下，召开“国民参政会”，按照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决定，通过了反对政协决议的议案。4月1日，蒋介石在参政会上公开宣布不承认政协决议各项原则的约束力，并声称：“东北九省在主权的接收没有完成以前，没有什么内政问题可言”，[※]为其大举进攻东北我军制造舆论。国民党无理要求我军退出苏、皖、热河、冀东及东北的大部分地区的企图，把我军限制在被分割的几个区域内，以便在完成全面内战的部署后加以消灭。国民党还违背停战协定中关于“所有中同境内的军事调动一律停止”的规定，自1月13日至5月底，先后向内战前线运送和调动了42个军、118个师共130余万人。自2月开始，在东北向我军发动进攻，在关内对我各解放区频繁进行骚扰和进犯，造成了“关外大打，关内小打”的局面。

对于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我党我军真诚拥护，决心认真执行。在停战协定签订的当日，党中央就发布了通告，要求我军一切部队、解放区的各级政府、共产党的各级委员会，严格执行停战协定的各项条款；在政协决议达成的次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指出：“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要求全党全军做好同国民党合作建国的思想准备。在《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通过后，我党立即拟就了具体的实施办法，并开始了部队的复员工作。随后，由于蒋介石集团破坏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行径日益加剧，党中央对形势的发展作出了新的估计，在继续争取国内和平的同时，强调全党全军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3月15日，党中央在对党内的指示中指出：“苏军已从沈阳及其附近撤退，国共两军在东北的冲突即将展开”。我“除开审慎应付东北问题外，华北、华中各地应即提起警觉，密切注意顽方动态，并在军事上作必要准备。加强整训，加强侦察，严防反动派突然袭击”。4月18日，党中央又指出：“蒋表面愿求妥协，以欺骗国人，暗中布置军事，阴谋甚大，……望准备一切条件，应付任何事变。各战略区主要负责人不得中央许可，不要离开队伍”。5月21

日，党中央在给各地的指示中进一步明确指出：“现全国性的内战危机极端严重，我应积极加以准备（特别抓紧练兵），加以制止，如不能制止，亦必须使全国性内战爆发的时间尽可能推迟，方对我有利，如不能推迟半年，即推迟三个月两个月以至一个月的时间爆发，亦将使我之准备比较充分。因此，我在目前对时局的基本方针，是避免挑衅，拖延时间，积极准备”。依据党中央的指示，全党全军同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的行径，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同时，从各个方面加强了对付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

[※] 见蒋介石1946年4月1日在国民参政会上的报告（载1946年4月7日《解放日报》）。